

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推动中外语言交流多样化

“携手合作、共创未来——2021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日前在京启动。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田学军表示，国际中文教育是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提供世界的语言公共产品，是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本届交流周以“携手合作、共创未来”为主题，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更多的合作平台，推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实现多样化、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启动仪式上，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乌干达教育与体育部、巴西大学国际合作集团、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苏格兰国家语言中心、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中国—东盟中心就合作设立中文教育项目签署了协议；与莫桑比克蒙德拉内大学就关于支持建设“语合智慧教室”签署合作协议；与德国柏林中文合唱团就合作设立中文音乐教室签署协议。启动仪式还首次发布了《国际中文教育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国际中文

在线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5)》《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等，发布了首批围绕《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研制的国际中文教育新时代精品教材和《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读本以及首档专门面向非洲国家的中文教学电视栏目《快乐中文》等一系列优质教学资源。2018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美洲赛区冠军柯鲁瀚和俄罗斯本土中文教师苏莎在启动仪式上分享了自己和中文的缘分。



“携手合作、共创未来——2021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日前在京启动。图为各方在云端签署协议。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供图

从认识方块字开始感知中国

柯鲁瀚



柯鲁瀚在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仪式上讲述自己和中文的故事。

我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小时候，对大洋彼岸的中国可以说是知之甚少，只觉得那是一个充满未知、非常独特的神秘东方国度。直到大二那年，我开始接触并学习中文，中美文化差异与抑扬顿挫的中文发音让我对这个东方国家十分好奇。

过去，我觉得那些复杂的方块字对我来说可能永远都会是个谜，万万不会想到，有一天我居然能看懂它们。当我在中文课上学会书写30个汉字时，我意识到，也许我在中文学习方面是有天赋的，这是一件值得我坚持做下去的事。

为了学好中文，我成了最常去学校中文辅导中心的学生之一。每天，我都会给老师念几篇中文新闻，让老师纠正我的发音，再与老师讨论新闻内容、练习口语。随着中文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对中国和中文的探索欲也越来越强烈。那时候的我就想，未来一定要到

中国看看。幸运的是，于2018年举办的第17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将我带到了中国。比赛期间，我不仅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组织下去青岛海水稻研究中心等地进行了体验，还和来自全球118个国家141个赛区的152名和我一样的中文学习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我真正身处中国，我发现中国比书本上描绘的更有意思，中国文化也比我之前所了解的更博大精深。经过努力，我幸运地获得了“美洲赛区冠军”，也收获了一些支持我的“粉丝”，这让我对中文学习更加有信心，也让我下定决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中文。赛后，我还获得了到中国学习的机会。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次中国之行打开了我人生的新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正如大家所见，近几年，我除了在中国努力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还和语合中心共同完成了一些记录我在中国的真实体验的视频短片；也到甘肃和贵州的十几个县拍摄纪录片，讲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故事；为中国各个城市拍摄宣传视频，和海外朋友们分享中国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入中国社会，努力感知与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我发现，原来中国还有许多我在家乡时不曾了解的动人故事。今后，我想要继续做一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把所见所闻分享给更多世界各国的青年朋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人民。

(作者曾获第17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美洲赛区冠军”)



苏莎在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仪式上通过视频致辞。

11年前，我与中文还素不相识。突然有一天，一条招生信息开启了我与中文之间的缘分，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随着俄罗斯与中国的人文交流逐渐加深，2010年，我通过相关交换项目来到了中国。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文。从见到汉字第一眼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它。它那么迷人，蕴含了璀璨的中华文化。那时，我坚定了一个目标——把中文学好，回到俄罗斯做一名中文教师，让更多的俄罗斯学生了解中文，爱上中文。

后来，我在多地访学。在不断学习中文教学本领的同时，我陶醉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里。2016年，我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毕业，顺利成为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中文教师。粗略统计了一下，我教授的学员近300人，参与组织了21次汉语水平考试(HSK)。在我的

课堂上，有稚气未脱的孩子，也有年近70的“中国迷”爷爷。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班上有两个孩子，他们住在莫斯科的郊外，到孔子学院上中文课，单程就需要2小时。几年来，他们的父亲风雨无阻地送孩子们来上课。为了让两个孩子喜欢学中文，父亲也拿起中文书本，和他们一起上课。

幸运的是，他们有机会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的夏令营，亲眼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正是无数个像他们一样热爱中文的学生，点燃了我的中文教学激情。正是他们走近中华文化时脸上的满足，使我坚信，我的选择是对的。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俄罗斯，也改变了我的教学方式。我每天都在思索，如何让远程教学变得丰富多彩，让学生们不会被网络带来的疏离感所影响。两年来，我一直坚守岗位，探索出了一套云端教学方法，也搭建了一座跨越空间、与学生心心相连的桥梁。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中文热在俄罗斯持续升温，中文还被列为俄罗斯高考科目之一。作为俄罗斯的中文教师，我倍感骄傲与自豪。我愿为弘扬中国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以回馈中国带给我的温暖回忆和无尽快乐。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作为本土中文教师的我们，会继续满怀热情，为中文之花开遍全球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

选择成为中文教师是对的

苏莎

延伸阅读

非洲国际中文教育联盟成立

本报电 日前，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浙江师范大学承办的非洲国际中文教育研讨会开幕式暨非洲国际中文教育联盟启动仪式在线上举办。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任马箭飞表示，目前已有16个非洲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30余所大学建立中文专业或中文师范专业，数以万计的毕业生成为建设非洲、促进中非友好的中坚力量。

在非洲国际中文教育研讨会上，浙江师范大学校长郑孟状表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做好语言支持，构建懂中文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培养机制，搭建中非有关各方在企业、院校等领域的合作平台。浙江师范大学将整合校内外资源，将“非洲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基地”建成集非洲中文教育领域发展研究、功能拓展、师资培养培训、教学研究为一体的大平台。

中非商会副会长、万邦德集团董事长赵守明建议，非洲国际中文教育联盟要紧扣“中文+职业”定位，推进“学校+企业”合作，针对非洲人才短板，集聚优势资源，开展联合办学、多点实训，提高中文教育成效，服务中非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中非人民友谊。

据悉，非洲国际中文教育联盟首批发起单位包括北京语言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埃塞俄比亚技术大学等。

此外，在非洲国际中文教育研讨会开幕式上，厦门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非洲国际中文教育联盟内9所院校代表和9家企业代表就战略合作进行了云签约仪式。

(包亮、钱明敏)

中国-马来西亚教育国际交流周活动落幕

本报电 日前，由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联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联合主办的中国—马来西亚教育交流周活动落下帷幕，100多位来自马来西亚的中小学教师、师范学院的中外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分6个专题，包括写作课的教学与设计、教师情绪的调节、理解儿童发展——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线上教学的方法与技术、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与教育、中马语文(华文)教育之比较。前5个专题为专家讲座，专家们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的教学案例进行了讲解。在第六场专题讲座中，中马双方老师分享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源流、师资培育近况和中国小学语文教育的课程标准和实践心得。与此同时，大家还交流了双方教育的异同、课堂教学的设计思路和方法等。

相关专家表示，经过此次活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教师不仅加深了理解，而且为后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王宇)

第一部全球中文教学资源发展报告出炉 筑牢国际中文教育根基

本报记者 赵晓霞文/图

12月13日，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在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全球中文教学资源发展报告——《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首次全面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包括教材、教辅、工具书、教育标准等纸质教学资源和数字教材、网络课程、教学网站、数字应用等数字教学资源)的发展状况，同时梳理了全球中文教学资源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资源建设解决方案。

70多年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哪些特点?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编审、“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项目负责人之一梁宇。

国际中文教材达19530种

记者：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国际中文教材在出版数量、编写质量等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梁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20年底，全球共出版国际中文教材19530种。尤其是2000年后出版数量迅速增长，数据显示，2001—2010年共出版7278种，2011—2020年共出版8039种。近5年，教材重印、再版、修订版增多，教材研制水平提高，教材建设进入“提质增效”的新发展阶段。

另外，国际中文教材的注释语种达80种。其中，82.42%的国际中文教材以英语作为注释语种，韩语和法语作为注释语种的教材数量位列第二、三位。

记者：这些教材涵盖了哪些教育阶段，呈现了怎样的特点?

梁宇：教材适用对象根据国别、年龄、文化背景、需求差异不断细分。目前，国际中文教材已涵盖国内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五大教育层次，包括入门、基础、初级、中级、高级等多个级别，涉及综合、技能、要素、专用、文化、考试、工具书等多种类型。这其中，国际中文教材“低龄化”需求受到重视，中小学中文教材出版数量“迎头赶上”，与大学中文教材的数量差距逐步缩小。2000年之后，全球共出版中小学中文教材



北京语言大学梧桐书坊内在售的各类中文教材。

1449种，其中中小学教材多于中学教材，大学中文教材共1866种。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中文教材凸显国际化、外向型特征，从教材“走出去”，逐步实现“走进去”“融进去”。2003年以来，各级各类国际中文教材年均发行世界101个国家的1200余个中文教学机构。13套主干教材达成版权输出贸易200余项。在海外20余个国家，70余套中文教学资源直接服务其国民教育体系内的中文课程。

中文数字资源大显身手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主课堂由线下转向线上，引发了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人士以及中文学习者对中文数字资源的关注。目前，中文数字资源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梁宇：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等技术的应用，中文数字资源发展迅速。目前中文数字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教材、数字教材、网络课程、数字应用几大类型。

数据显示，现有中文数字教材3679种，其中中国开发1744种，占比47.40%，国外18个国家开发本土中文数字教材共1935种，占比52.60%；现有慕课485门、微课4865节、教学网站404个——开发者分布于全球25个国家；现有APP应用334款。

记者：总体来看，中文数字资源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智能化产品越来越丰富，这给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带来哪些改变?

梁宇：中文数字资源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基本实现“教、学、管、评、研、用”全覆盖。教学流程的数字化重塑，可以辅助教师实施差异化教学，开展教学研究；帮助学习者进行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协助管理者实施精细化管理和精准化服务，全面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和教学改革。

目前，主要中文教学平台采用“公益免费、盈利收费”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注册用户数量大幅提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文联盟”数字化云服务平台吸引了来自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的210万用户；虎帝智能中文学习平台已进入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所学校。尤其是疫情期间，中文

数字资源更是大显身手，为实现国际中文教育“停课不停学”的目标提供了基础保障，大规模的中文在线教学实践也为未来资源建设开展了有益探索。

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记者：国际中文教育标准是教学资源研发和使用的主要依据，到目前为止，全球各类国际中文教育标准有多少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梁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

此次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各类国际中文教育标准达144部。其中，除中方主导研发的39部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外，由海外各国教育管理部门或权威机构研发的国际中文教育标准达105部。

沿着时间的轴线往回看，1988年，我国正式颁布第一部国际中文教育标准——《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试行)》，使国际中文教育开始朝着“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迈进；1992年，发布《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6年，发布《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2010年10月，国际中文教育首个国家标准《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和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语言文字规范发布；2021年3月，首个面向外国中文学习者的中国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发布，这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里程碑。

另据“国际中文教育标准数据库”统计，截至目前，中国以外国家或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各类中文能力标准、中文课程标准、中文测试标准达105部，包括4部全球性标准、1部区域性标准和100部国别和地区性标准，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的31个国家。其中，研制并发布中文教育标准的欧洲国家最多，有13个，占总数近42%；亚洲国家7个，非洲国家6个。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中文教育标准的研制和推行不仅对研制和发布国中文教育发展意义重大，也可向周边其他国家中文教育提供借鉴。

(王宇)